

基于文化自觉的教育研究本土化

罗生全, 靳玉乐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文化自觉促进了教育研究思维的“本土化”,厘清了教育研究本土化的认识论基础,为教育研究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教育研究本土化不仅仅是一种本土行动,更是需要以本土文化精神为路标,将本土问题作为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以本土行动作为其实践着力点。文化自觉论为教育研究本土化设定了路径,我们应从建构“本土”教育理论架构、确立基于整体论思维的教育研究范式以及社会行动取向的实践运演出发,实现教育研究本土化。

关键词:文化自觉;教育研究;本土探索;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2-0005-07

教育研究在内生力与外发力的共同驱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范畴均得到了完善和多元阐释,并在不断变换的视野与视角下形成了众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教育研究本真的扭曲使其面临逐步丧失主体地位的危险,并在累累成果的光环下迷失了自身的方向,进而引发了教育研究本身的危机,需要我们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认识、改进和完善教育研究。

一、文化自觉在教育研究中的意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196}是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的集中表述,意指文化个体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应明白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在生活中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即准确把握其文化要义和发展方向,并明了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体现了“文化自觉”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与层次的逐步提高。“文化自觉”从“各美其美”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开始,发展到肯定和容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美人之美”,再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间取得文化价值标准的共识,做到“美美与共”,从而走向“天下大同”,实现人类的美好愿望。“天下大同”既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反映,也是“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天下大同”实现的基础是正确理解不同文化差异的本质,文化个体对自身文化不再惟我独美,摆脱本位中心主义,不强求别人“从我之美”,而要承认多元并存,能够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和而不同”,尽可能做到“美人之美”,进而,通过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融合,在实践中探求出一些能使不同文化都可以接受的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这种共同的价值标准规范文化个体的立身行事,最终实现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天下大同”^{[1]7-8}。教

收稿日期:2015-10-16

作者简介:罗生全,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靳玉乐,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乡一体化教育运行机制研究”(14SKB028),项目负责人:罗生全;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课程的理论模式与实践体系研究”(2014PY73),项目负责人:罗生全。

育研究既是一种文化存在,又是一种文化表现,是特定文化的结果。文化自觉设定了教育研究植根于本土文化及本土教育实践的研究取向与践行模式,对于教育研究本土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自觉促进了教育研究思维的“本土化”

教育研究思维方式随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变革而变革,经历了从科学实证范式到人文科学研究典范再到后现代多元化时期的关系思维模式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教育研究者们常常坚持以盲目肯定或否定、二元对立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教育研究,造成不同研究成果及其相应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使得教育研究成为某一个体或者团体的私人之事。文化自觉诠释了思维方式的发展过程,认为基于不同文化根基的思维方式均有其存在的场域与合理性,都是对植根于本土文化和本土问题加以认识 and 解决后形成的,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判。教育研究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思维方式不断转变和创新的过程,不过,此过程不得不面对当前思维方式与外来思维方式的碰撞与“和平共处”。文化自觉首先承认各种思维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并在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共识,成为一种行动。也就是说,文化自觉将植根于本土文化、本土理论和本土问题解决的教育研究作为研究思维的起点,是以“本土化”为起点和根本旨归的教育研究范式,是以立足自我主体为研究基点,并在认可和创造性吸收他者思维的过程中,不断建构本土化的教育研究。本土化作为教育研究的本土存在,可以有效解释教育研究范式从西方一元宰制到多元并进的历史发展趋势,倡导通过“本土生长”来逐步达成基于本土传统的话语体系,凸显主体自我意识。进而,文化自觉下的教育研究本土化将西方教育研究范式仅作为一种“他者”参照,而不是主体定位,使其成为本土教育研究不断延续和发展的补充,而不是“喧宾夺主”“吞并”与“蚕食”。

(二)文化自觉厘清了教育研究本土化的认识论基础

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又称知识论,主要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2]。然而,深层意义上的认识论还指向认识的方法论,对认识论所取得的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等认识成果进行某种再认识,即认识的认识,也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反思。认识方法论问题决定了我们不但要通过多种途径建构关于认识对象的各种知识体系,不断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更需要反思这些建构起来的认识体系,以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我国的教育改革便陷入了一个误区:在众多忧国忧民学者尤其是留洋学者的倡导下,西方教育理论一度成为消除教育弊病和拯救社会的良药,成为教育改革的指南针,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了教育研究的各个层面。然而,这种西方式的研究和实践由于忽略了本土问题,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使文化传统断裂。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拿来主义式”的教育研究用于研究教育问题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不能忽略的是,将这种植入式的研究作为一种主流或者是唯一范式则是一种不自觉的表现,缺乏教育研究的动力来源于实践这样一个常识性认识。文化自觉下的教育研究本土化代表了一种理论基础、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信念,是指向教育研究及其实践的“纲”与“基”。由此,文化自觉下的教育研究本土化不但厘清了教育研究的生长基点与指导方向,更为对待本土研究和西方研究提供了一种认识上的方法论,促进了教育研究与实践问题的不断解决和良性创生。

(三)文化自觉为教育研究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当下,我国教育研究正受到众多学科话语的“侵染”,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新兴词汇与思想正在急速嫁接为相应的课程术语,加之我国现代教育理论及其体系深受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对传统教育理论采取了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态度,致使许多教育思想并没有对教育实践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深入分析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国部分古代教育思想多为零碎的观点、主张或心得,缺乏系统性,没有经过理性的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使其不能直接用于现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其

次,因传统教育理论研究取向、研究程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等与现代教育研究被人为“区隔”,造成当代研究对传统教育理论的漠视,同时,我国教育研究的现代定位也致使传统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这种抛弃本土教育思想和“远离”本土问题而展开的研究,必然造成教育研究本土化的缺位,使其落入西方研究的套路而无法自拔。文化自觉论以自我为根基,以他人为借鉴,最终走向和谐共生。这为教育研究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和研究方法的支持,其原则在于保持方法论上必要的张力,有助于我们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找出植根于本土的传统价值,认同、保护、挖掘、整理和利用传统教育思想,并依托本土问题进行现代阐释,实现内发性的教育研究本土化,同时理性对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精神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文化自觉表征

教育研究本土化不仅仅是一种本土行动,更是需要以研究本身所体现的未来价值为根基,将教育研究的价值追求作为路标,保持与社会文明整体发展一致,并以传统价值作为持续创新的逻辑起点。

(一)以本土文化精神为路标

教育研究本土化不是研究的一种情结,而是一种理性,有其理性的根基。首先,任何研究都会受到自身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特色的影响,必须坚持其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但不能固步自封,否则就会成为狭隘的“本土主义”,导致其成为国际化的“边陲地带”;其二,本土化同样是一个在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不断生长、不断更新的过程,需要彰显本土价值,并合理吸纳外来智慧以加速这一过程的完善;其三,在中国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本土理论,不应仅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药,还应使之成为走向国际的一种战略,在保证“学术自主性”的前提下经由理性的反思,达到一种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显然,走向批判和开放的教育研究本土化是基于本土价值理念、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等“本土性”差异而不断进行的一种自我解放。世界各国教育研究史不断证明,因各国“本土性”差异的缘故,任何国家的教育研究均经历了彰显本土文化价值,将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作为教育研究的指导以及吸纳其他先进教育理念和范式的前提这样一个过程,即使是当时深受欧洲教育影响的美国、日本,其各种研究也概莫能外。

从文化自觉论的角度看,教育研究应关注当前社会的文化体认、文化价值和文化设计,这是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文化体认需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教育研究者应体察研究者本身以及研究对象所立足的文化根基,并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离析出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一致的文化要素,结合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此找准自身的文化定位。文化价值是社会体系建构中的核心要素,“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正义”是其根本,三者之间互为基础和条件,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结构,是未来社会文明的主要推动力。鉴于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非中立取向,教育研究这种人类实践活动也不可能是中立的,必然是基于价值理性的研究,其本土化过程必然应将这些“领导性”价值作为方向,不然则会导致研究方向出现偏差,造成研究结果“背离”研究目标。威尔士认为,世界文明的主要精神在于设计,是一种涵括个人生活领域、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以及国家机构制度的文化转化与创新^[3]。这就是说,教育研究本土化应以“领导性价值”为基础,充分关照各种文化价值,使教育研究与文化价值体系不断丰富、与时俱进,达至“美美与共”的境界。

(二)以本土问题研究为逻辑起点

教育研究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基于各种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过程是特有的实践活动方式,其形成的成果是一种实践成果。换句话说,教育研究是实践的结果,是研究者针对本土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活动,这一点已经在世界各国的本土化教育改革中得到了印证。就美国而言,“美国的教育变革所针对的问题,是本土性原发问题。美国在将欧洲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本土问

题保持敏感,避免盲目地接受或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秘诀之一”^[4]。我国教育研究所针对的问题仍然是本土性原发问题,是在对本土问题保持敏感性的同时,运用彰显传统文化价值的中国文化精神对其进行理性审视,并借鉴他国文化影响下的各种成果中的有益成分,采取与研究者和实践者相契合的研究程序与方法,最终形成解决方案和各种成果。就教育研究的层次看,教育研究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问题,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的问题主要关注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基础、基础理论以及各种元研究;中观层面的问题主要指向围绕教育基本理论和实践形式而进行的各种学术研究,将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微观层面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实践中,实践问题中蕴含的深刻道理与学理是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源泉和支撑。

首先,文化自觉论将体认与省思传统文化作为首要条件,这使本土性问题成为教育研究的逻辑基点。但我国的教育研究从近代中国开始便没有脱离西方的“魔咒”,以致于本土问题西方化,忽略对教育研究本身的本土化探寻,也没有对本土性问题进行中国化研究与解决。其次,教育研究本土化理应对本土知识体系进行传诵与创造性转化,然而,研究者却很少真正进行本土认同与关怀,使得西方的科学理论、知识成为圣经,导致充斥西方话语的研究推广性不足,从而造成被动性“失语”。其三,教育研究的政治关怀。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不难看出,教育研究意味着本土的政治关怀,应坚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理论取向,对本土教育政策进行学理性的政治关怀,但不是基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关心政治或依附政治。这种具有政治关怀的教育政策研究/结果,其实践体系及操作模式是一种植根于本土问题的理性建构,而非西方理论的中国实践。同时,研究者应具有“反殖民化”立场,摆脱西方理论体系的“控制”与“束缚”,将研究问题置于我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从中国“问题场域”中展开研究和设计,以全球性宏阔视域拓展其思路,激发其灼见,在知“己”知“彼”中实现文化身份的确定或认同。

(三)以本土行动为实践着力点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全球化的经线与地方化的纬线编制而成的。当地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界限不断地被超越,当地的文化不断地适应全球化也反抗全球化^[5]。这种多元文化之间的不断融合所形成的“混乱情景”,使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以何种思维方式与行动路径开展实践。文化自觉将民族认同作为思维的起点,将认可和深化本土文化作为过程,这给了我们“全球思维,本土行动”的启示:将本土行动作为实践着力点,有机结合各种观念与本土问题,实现本土的自我建构和与“他者”的互补共生。其支点在于本土契合性,即:由于受到同一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便易于形成一种契合状态,其思想观念与当地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易于密切配合、贴合或契合^[6]。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研究者只有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哲学基础、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的教育实际,在关照我国教育中长期规划背景下,不断审视其内部深层次问题,才能实现本土价值的提升与外来观念的本土化。

以本土行动作为实践着力点的教育研究经历了文化觉醒、主体性反思、文化增值和具体行动几个过程。首先,教育研究的文化觉醒。教育研究者应明确自身的基本假设、价值、目标、信仰、沟通模式,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在广阔的视域下,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的研究假设、过程、方法及结论,理解不同成果之间的相融和不相融,降低因不同文化基础而产生的研究对抗性。其次,教育研究的主体性反思。这意味着对自主性的追求和肯定,凸显自身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话语体系的不断重建。其三,教育研究的文化增值。文化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文化不但可以被改变也必须不断地改变与创新^[7]。教育研究者也就在文化传承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实现着文化的不断重建和教育研究的不断推进,既促进了文化增值,也因其研究主题、思路、程序等的变化而实现教育研究成果的累积性增长。其四,教育研究的具体本土行动。本土行动不是狭隘的本土化,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土零

碎性知识的增长,而是在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切实关照本土的需求和实际,建构扎根于本土的系统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并在基于本土文化解决本土问题的基础上创新教育研究体系与方法。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文化自觉策略

文化自觉论为教育研究本土化设定了路径,我们应从建构“本土”教育理论架构、确立基于整体论思维的教育研究范式以及社会行动取向的实践运演出发,展开教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一)建构“本土”教育理论架构

“本土”与“世界”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教育研究本土化也不例外。就概念体系而言,教育研究本土化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即教育的本土化研究、教育研究本土化和教育实践本土化^[8]。教育的本土化研究主要指涉及本土化议题的相关教育研究,涵盖理论与实证的各类议题,涵盖范围在三者之中最广,研究者可根据某种理论或实证方法来探讨任何关于本土化的教育议题。教育研究本土化是教育本土化研究中的一种,但属于一种元研究,探讨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本土化的问题。教育实践本土化则指向实践,主要根据上述两种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将其运用于实际的行动中,藉以改善由于没有反省就直接将西方理论带入现场而造成诸多问题的状况。其实这三种研究正好反映了教育研究本土化的三个面向,分别指向元研究、研究本身和实践研究,它们之间彼此相关、涵盖及相互影响,三者无法完全切割。本文在文化自觉论指导下的教育研究本土化偏向于后设研究,通过反省过去教育本土化研究中的问题,提出未来进行教育研究本土建构的可能方向与实践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主要为教育研究本土化提供一种“本土”的教育理论架构,以此指导教育研究的本土化。

教育研究本土化的三个面向包括理论、实证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就理论层面而言,教育研究者以西方(主要是美国)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来研究我国教育现象及教育实践问题的弊端,促使我们不得不从根本之处反省盲目或不加批判地运用他国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开展教育研究的问题,厘清教育研究的本土化概念体系,以此建构可能的理论概念与架构。就实证层面而言,教育研究者不应只关心他所认同的特定本土或西方的概念,而是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并将其与现场交织,通过这些概念体系去影响实践过程,并建立起一套属于本土理论体系的实证研究系统,既体现其逻辑结构,也说明其程序与方法结构。就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教育研究者应坚持一种相对中立与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抛弃非此即彼的本土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观,通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检证,重新审视、修正或丰富原有理论架构,从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与提炼新的理论成果。当然,一旦一种成熟的理论形成,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探讨的层面,而是应提出更为具体的解决现场实践困境的策略,使其更具实用价值。

(二)确立基于“整体论思维”的教育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中,本土认识论与知识被边缘化,导致了教育研究的认识论危机,也体现了西方文化殖民下的认识论暴力实践。文化自觉论告诉我们,教育研究是植根于一定文化范式的,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中国式的教育研究一定是基于中国特有文化的研究,尤其是联系性思维方式,对于其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联系性思维是将个人、世界和宇宙的诸多部分建构紧密的联系性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的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全体之间,是一种有机的而非机械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整体论思维范式的体现,是教育研究的根本指导。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史来看,人类思维方式正从“实体思维进入关系思维”^[9]。思维方式的变革极大地影响着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而教育研究也顺应了这种思维方式变革下的研究范式转换。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趋向与我国本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的“不谋而合”,共同决定了我国的教育研究应是一种植根于本土

文化的研究,应以“整体论思维”作为其思维范式。

无论是本土价值的彰显,还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抑或是人类哲学的综合发展,都昭示了整体论思维对于教育研究范式的奠基作用。这首先要求教育研究者将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作为自身研究的起点与归宿,整体关怀研究对象,在探寻各种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整合这些问题,并探寻教育研究的规律。其次,整体把握东西方研究。基于整体论思维的教育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囿于自身的文化基础而不能自拔,而应理性审视西方分析性思维的价值,将其有选择地整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联系性思维中,以思维方式引领研究创新。东西方研究结合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对教育史的研究一般采取综合也即辩证的方法,即运用联系、动态和全面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对教育现实问题以及所反映的不同侧面的规律的研究则一般采取分析方法,并运用整体思维方式不断反思与改进。也就是把分析认识方法与综合认识方法科学地、内在地统一起来,也即在一定程度上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科学地、内在地统一起来。其三,将科学性作为教育研究的追求。基于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研究应该是教育研究的“共同语言”,这也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一方面,要求建立全面、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研究者与实践者以及其他研究者进行对话的平台,并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作为对话与研究的理路,将“本土行动”与“国际视野”作为教育研究持续生长的动力。

(三)社会行动取向的教育研究实践运演

教育研究是基于本土文化并着重培养本土人民本土意识及其相应行为的一种研究,旨在形成多元的观点和发展跨文化学习能力,在接纳差异性存在与质疑现存普世真理的基础上,找寻主体和彰显自我价值。教育研究这种以主体意识觉醒为核心并借助本土媒材的研究取向,体现了社会行动取向的理论与实践,是立基于全民行动的研究框架。社会行动取向源于“权由民生,主权在民”的思维,社会问题和议题的解决是全体人民认知和参与的结果,表现为对所在环境关注、理解、探究以及尝试解决问题等这样一些个人或群体行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社会行动取向的教育研究首先在于促进教育研究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以及受益者的知识与伦理,敦促各自在了解与反思自身立场的基础上,重视共同的利益与幸福追求。其次,建构以“差异”为基础的多元观,尊重不同的意见和偏好,尊重不同文化体系下人们的价值诉求,并以此建立一种追求社会正义的普世研究取向,促进研究者主体文化意识觉醒并自觉规范。其三,社会行动取向的教育研究坚持共同理想下具体行动的学术观,一方面针对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各种体系运行的共性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则基于本土问题而不断深化其理论框架,使其在实践验证中得以不断充实,进而推动共同理想的实现。

社会行动取向的教育研究实践运演,首先应形成教育研究的社群意识及行为。社群(社会群体)指“分享共同承诺、想法和价值而在一起的一群人”^[10],体现了现实建构的各种关系。国际视野下教育研究的本土行动必然是本土研究者的本土实践,凡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和学术规范开展教育研究的个人和群体,都是平等的研究主体,体现了平等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共权的研究价值取向打破了过去那种因研究领域、研究者所在场域以及理论取向不同而形成的各种壁垒,通过建立研究社群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以集思广益的方式使其在协商和平等对话中,不断推进教育研究的深化与理论成果的丰富。其次,保证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连续性。为了避免各种研究的有意或无意断裂,社会行动取向秉持“由点到面再回到点”的观点,给研究者创造一个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氛围,使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关照各种相关研究成果,并用以不断丰富和深化自身的研究问题,拓展研究视野和领域。其三,倡导研究者文化觉醒基础上的自由研究。社会行动取向的教育研究必须激励本土知识分子对于再现、他者、权力、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角色以及批判意识等议题保持敏锐与警觉,使本土的教育学术主体与西方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积极的交流、对话及共同思考,而不是仅仅成为国外资料的收集者。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 14 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 黄爱宝,高小平. 行政哲学的“问题域”[J].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4(6):9-11.

[3] 冯朝霖. 为谁辛苦为谁忙? ——论教育学术发展策略与理论本土化[J]. 研习资讯,2009,23(6):33-37.

[4] 马维娜. 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合理性追究[J]. 上海教育科研,2001(4):8-11.

[5] SMITH M P.Power in place:Rethorizing the local and the gobal[M]//JAN L, CHIRSTOPHER M. The urban sociological reader. 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5:241-250.

[6] 杨国枢. 教育科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M]//杨深坑. 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台北:扬智文化,1999:5-28.

[7] 龙应台.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72.

[8] 黄腾. 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再省思——困境与可能[J]. 教育研究集刊,2009,55(3):1-28.

[9] 李德顺. 人类思维面临着变革[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1):1-7.

[10] SERGIOVANNI T J. The lifeworld of leadership:Creating culture, community, and personal meaning in our schools[M]. 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0:59.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Based 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UO Shengquan,JIN Yule

(Faculty of Education , Southwest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715 , China)

Abstract:Cultural consciousness promote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nking, clarifies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also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it.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s not only a kind of localized action, but also needs to take the local cultural spirit as its guidepost, regard the local problem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 activity, and consider the practical choice of local action as the focal point of its practic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the path to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We should fulfill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by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loc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the holistic thinking and carrying out some social-action orientated practice.

Key words:cultural consciousness; educational research; local exploration;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 邓香蓉